

周易 四書 禪解

首部以佛解易解儒的佳作

【明】智旭 著
陈德述 注释
施维点校



周易·四书禅解

(明)智旭 著

施 维 点校

陈德述 注释

(京)新登字 174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周易·四书禅解/(明)智旭著;施维点校;陈德述注释. —北京:
团结出版社,1996.12

ISBN 7-80130-080-7

I 周… II. ①智…②施…③陈… III. ①周易—注释②四书—注
释 IV. B221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96)第 21598 号

责任编辑:杨永德

封面设计:文绍安

*

团结出版社出版(北京东城区东皇城根南街 84 号)

北京怀柔中科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经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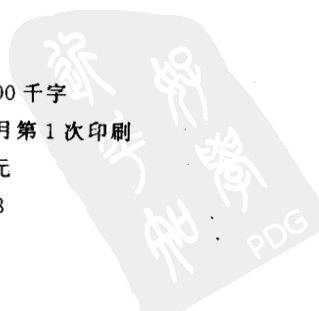
*

850×1168 1/32 17.34 字数:400 千字

1996 年 12 月(32 开)第一版 199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10000 定价:24.00 元

ISBN7-80130-080-7/B·3



绪 言

陈德述

《周易禅解》是明代四大著名僧人之一的智旭作品。施维先生点校之后，嘱我为之作注和写篇绪言。这实际上是有不少困难的，因为易道广大，佛法无边，为要对用无边佛法注解的周易再作注解岂非易事，加上时间仓促，就更加不容易了。所以，只得硬着头皮啃啃这个“酸果”。

—

近年来，由于“周易热”，使社会各阶层的人对周易有浓厚的兴趣。但是，对《周易》的内容、易理及其价值，易学发展的历史及其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有所了解的人并不多，竟然有人问，“周易是哪里的？”不少人对周易的兴趣在卜筮算卦方面，走入了邪道。同样，对于了解佛教的人也不多，在汉族地区，虽然有人在佛、菩萨面前上香、跪拜，或由于盲目信仰、或由于无意识。为要读懂《周易禅解》这部书，不但要懂得《周易》的义理与象数，还要懂得佛理佛法，否则真是云里雾里。

佛教是古代印度释迦牟尼（约公元前 565 年——485 年）所创立的。释迦牟尼是释迦族所建立的迦毗罗卫国饭净王之子。姓乔答摩，名悉达多。“释迦”“牟尼”意为释迦族的圣人，是佛教徒对他的尊称。“佛”是“佛陀”的简称，是梵文 Buddha 的音译，意为“觉者”、“知者”、“觉”。觉有三义，“正觉”、“觉他”、“圆觉”。佛教传入中国以后，和中国本有文化发生矛盾、

冲突、斗争，最后吸收中国文化并逐步与中国文化互相摄取、含化形成中国化的佛教。

由于佛教渊源于印度，所以有它自己独特的概念、范畴体系，独特的思维方法、理论结构和价值追求。如佛教的概念有音译和意译两种：音译的概念，诸如“佛”、“般若”、“三昧”等不能从字面上去理解；就是意译的概念，诸如“色”、“法”、“我”、“漏”、“真理”等等也不能只从字面上去理解，它们有它独特的含义。“色”，相当于物质，指一切能变坏有质碍的事物。“法”，指事物或存在。“诸法”，指一切事物，包括物质或精神的。“我”是主宰或实体的意思。“漏”，指烦恼。这些概念在佛教中的含义，与我们平常所了解的完全不同。再如佛教的“真理”，并不是指对客观事物的正确认识，而是指“真如”。心即真如。真者真实，如者如常不变。佛教认为，外间的一切事物和现象都是虚妄不实、生灭无常的，只有心才是真实不变的。可见，他们说的“真理”与我们平常说的“真理”，其内涵有着天壤之别。佛学概念均有其自己的特殊规定性。

佛教的哲学理论基础是“缘起”说，认为世间的一切事物都处在因果联系之中，依一定的条件发生变化。在此基础上，建立一套独特的宗教理论体系。

第一，“四谛说”：即苦谛、集谛、灭谛、道谛，是关于生死和涅槃因果的理论。苦谛，认为世间一切皆苦，人从生到死充满了无穷的苦恼，有生苦、老苦、病苦、死苦、怨憎会苦、爱别离苦、求不得苦、五盛阴苦。集谛，集是集合的意思。集谛是说一切都是由条件集合而成，是探求引起苦的原因的真理。认为“爱”和“欲”是世间一切苦的根本原因。灭谛，是探求人生如何解脱苦果，消除烦恼业障的途经。佛教认为，经过长期的修行，达到涅槃境界，就能获得解脱。可以说，灭谛就是证得涅槃，获得解脱的真理。道谛：指断除“苦”、“集”而达到

涅槃的理论和方法，即“八正道”等。

第二，“五蕴说”：“五蕴”又译为“五阴”，意为五种类别和五种积聚。佛教认为，世间的一切都是由五种因素积聚而成的，生灭无常，没有常固不变的主宰。五种因素就是：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识五蕴。“色蕴”：指构成世界的四种物质，即地、水、火、风“四大”。“受蕴”：指外界作用于五官而产生的感受。“想蕴”：指理性、概念活动。“行蕴”：指心理、意志活动，即造作。“识蕴”：指总的意识，即把想、行、受三蕴会聚起来，能对境界觉了分别。“了”谓觉了，“别”谓“区分”。这“五蕴”是对有为法所作的概括，有广狭二义，狭义指现实的人，广义为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的总和。这是佛教所研究和分析的基本对象。

第三，“十二因缘说”：为佛教“三世轮回”的基本理论，包括：无明、行、识、名色、六处、触、受、爱、取、有、生、老死等十二部分。它们的缘起关系是：无明缘行、行缘识、识缘名色、名色缘六处、六处缘触、触缘受、受缘爱、爱缘取、取缘有、有缘生、生缘老死。这十二个部分，转辗成果，称为“因”。互为条件，称为“缘”。两者之间构成因果关系。

第四，法印说：“法印”是印证、标志的意思。法印包含三个独特的命题，即：诸行无常、诸法无我、涅槃寂静。“诸行无常”，是说世间的一切事都是时刻处在生灭变化之中，没有常住性的。“诸法无我”，是说世间一切现象是因缘和合而成的，没有独立的实体或主宰者。“涅槃寂静”是说超脱生死轮回，进入涅槃境界。此三法印是佛教学说的三个特征，亦称“三相”。

第五，空论，是佛教各派的重要教义。“空”指事物之虚幻不实，或指理体之空寂明净。佛教认为，世界一切现象皆因缘和合而生，没有质的规定性和独立自在的自体，是假而不实的，故“空”。但佛教对“空”的解释各有不同。从否定对象上看，

分为“我空”和“法空”两种。从论证的方式上说，分为“分析空”和“当体空”两种。分析空就是把物质和时间分析到极微的“无方分相”和“无前后相”时，即显空相。当体空就是说对一切事物无须分解，只要用空的理法去观察，就可以明白事物本身是空的。从是否有终极真理来说，又有“但空”和“不但空”两种。把空看成是绝对的虚无，认识不到它是有一种存在形式，是但空；相反，如果能认识到事物不但有空的一面，还有不空的一边，空有不离，空有互摄，但不但空，即中道空。佛教各派还对空有种种不同的解释。总之，佛教认为：世界的一切事物和现象是空而不实的。

第六，因果论：即因果报应说。因是指原因，是能生；果是指结果，是所生。佛教认为，世间的一切事物，没有一个不是因缘和合而成的，因此有因必有果，有果必有因，世间的一切都处在因果联系之中。有“四缘”、“六因”、“十因”、“五果”等理论。四缘即因缘、等无间缘、所缘缘、增上缘。六因即能作因、俱有因、同类因、相应因、遍行因、异熟因。十因即随说因、观待因、牵引因、生起因、摄受因、引发因、定异因、同事因、相违因、不相违因。五果即异熟果、等流果、士用果、增上果、离系果。佛教认为，人在现世中的种种遭遇和造作，是前世之果，亦是来世之因。因果报应说是佛教的宗教理论体系中的基本理论。

以上是佛教理论中最基本的东西，也是读懂《周易禅解》所必须具备的最起码的佛教知识。

二

智旭（1599—1655），字素华，别号“八不道人”，晚年称“藕益老人”。俗姓钟，名际明，古吴木渎（今江苏吴县）人，生

于明代万历二十七年（1599）。少年时崇尚理学，敬服陆九渊和王阳明的心学，反对佛老，著《辟佛论》数十篇。后因读《莲池自知录》和《竹窗随笔》改变对佛教的认识，不再反对佛教，将《辟佛论》焚之。天启二年（1622），从高僧德清弟子雪岭剃度，取法名智旭，进入径山（今杭州西北）修禅。后受具云栖寺，接着又受菩萨戒。此后，遍阅律藏，决心弘律，著述《毗尼事义集要》及《梵室偶谈》。崇祯四年（1631），究心天台宗，但又称不肯为天台宗子孙。次年，入灵峰山（今浙江孝丰县境内），造西湖寺。晚年，皈依净土宗，撰《净信堂集》。清顺治十二年（1655）正月在灵峰寺圆寂，寿五十七。

智旭一生著作不少，共四十余种，其门人编为《宗论》和《释论》两大类。《宗论》即《灵峰宗论》，共三十八卷。在其全部著作中，《阅藏知津》是最具有特点的著作。

智旭生活的明代，是我国封建社会的末期，长期为封建统治者服务的意识形态都处在衰微之中，佛教亦如此。明代佛教较为活跃的主要有禅宗和净土宗，其余各宗，乃气息奄奄。就是禅宗即已堕落。智旭指出：“今时丧心病狂无耻禅和，影响窃掠，听其言超佛祖之先，稽其行落狗彘之下”。智旭见“禅道僭滥”，而悲感“不忍见闻”而“痛哭流涕”（《灵峰宗论》）。在佛教如此衰微的情况下，智旭在理论上提出“融会诸宗”的主张。

智旭主张融会性、相二宗。性宗以天台宗和华严宗为代表，它主张真如缘起，以为唯一真心是诸法产生的本源，一切善恶染净均在一心之中，禅宗亦属于性宗的范畴。相宗以法相唯识宗为代表，它主张阿赖耶识缘起，用“识”说明诸法产生的本源，通过分析法相，说明诸法唯说的性质。对于这性、相二宗，智旭认为是，“犹波与水，不可分隔”的，合之则互存，分之则两伤。还指出：性、相二宗的“源头”，皆是“现前一念”，由

此“则知三乘十二分教，皆吾心识注脚”（《灵峰宗论》）。智旭关于性、相二宗融会的主张，即以贯彻在《周易禅解》之中。

智旭还主张禅、教、律三者的统一。智旭的这一主张亦是针对当时佛教的衰败而提出来的。他批评当时佛教的状况时指出：“今之学者，不惟分门别户，纵发心遍学，曾不知其一以贯之。所以，一入律堂，便将衣钵锡杖为标榜；一入讲席，便将消文贴句为要务；一入禅林，便将机锋转语为茶饭”（《灵峰宗论》）。即是修行一二十年，甚至高居方丈，自以为通禅、通教、通律的，若真正以佛心、佛语、佛行进行考核，很少有不违背的。所以，他认为不应把禅、教、律分裂开来，而应该是“同条共贯”，统一一致的。他说：“禅者佛心，教者佛语，律者佛行”，三者是一个整体。但是，今人只“知宗者佛心，教者佛语”，而“不知戒者佛身”，若此，“纵透千七百条公案、通十二部了义，止成依草附木，无主孤魂而已。”（同上）在智旭看来，“禅者教之纲，教者禅之纲”，“宗者无言之教，教者有言之宗”。即是说，不仅禅、教、律要统一，而且宗和教也要统一。它们都应统一在“直指人心，见性成佛”这一佛教的真旨上。

第三，推崇净土宗。净土宗是以专门修行往生阿弥陀佛净土的法门，宋代以后，成了佛教各派的共同信仰。到了明代亦是如此，出现了禅净双修状况。净土宗以佛教共宗的姿态传播着。智旭思想的特点是，“融会诸宗，归报净土”。他念佛的目的，是要“求生西方”。智旭先是修禅，不打算“往生净土”，后来发现毫无用处。继则禅净双修，进而发现末代禅病极为严重，最后舍弃参禅而“专事净土”。智旭通过他自己三十多年的实践证明，要想获得解脱，净土法门比起禅道来要直捷得多。于是，他立下万牛不能挽回的“求生西方”之志。

第四，援佛入儒，主张佛儒一家。智旭用佛教的概念、思想、价值观来解释儒家的概念、思想和经典。如以佛教的唯心

来解释儒家的“人心惟危，道心惟微，惟精惟一，允执厥中”这“十六字诀”；以“菩提之基”解释“孝道”；以“明心见性”解释“尽心知性”；以“正念真如”解释“忠恕”；以“五戒”解释“五常”；以“真释”解释“真儒”；以“妙心”解释“知”，以“一心三观”解释“致”，以“幻现”解释“物”，以“推究幻影”解释“格”，由此，“致知格物”完全丧失了儒家的原意。智旭的结论是儒佛一家，三教同源。就“本源佛性”上说，三教原来是一家，“大道之在人心，古今唯此一理，非佛祖圣贤所得私也。统乎至异，汇乎至同，非儒、释、道所能局也。克实论之，道非世间，非出世间，而以道入真，则名出世；以道入俗，则名世间。真与俗皆迹也，迹不离道，而执迹以言道，则道隐。”“道无一，安得执一以为道？道无三，安得分三教以求道？”智旭认为，三教有一个共同的目的，治世或给世间以福祐，只是达到目的的途径不同而已。智旭说：“三教深浅，未暇辨也，而仁民爱物之心则同”，“充恻隐之心，仁不可胜用，儒以之保民，道以之不疵疔于物，释以之度尽众生”。“自心者，三教之源，三教皆从此心施設。”（《灵峰宗论》）由于仁为三教之源，那么三教圣人的根本任务是“不昧本心而已”。

概言之，智旭思想的特点是内则主张诸宗融合，外则强调儒佛一家，三教同源。

由于智旭倡导融会佛教各宗派，因而在对《周易》的注解时，虽名当《周易禅解》，实际上不只使用禅宗的思想，还使用了其他宗派，如天台宗、华严宗、唯识宗的思想。在《周易禅解》中，智旭强调“即心是佛”、“顿悟成佛”的思想，更强调定慧双修，认为有定无慧，或有慧无定都是不能“明心见性”，进而“见性成佛”的，只有“慧与定俱”，“定慧双修”，才能达到目的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《周易禅解》是颇具有禅味的。智旭以禅解《易》的目的何在呢？他指出：“吾所由解《易》者无他，

以禅入儒，诱儒知禅耳。”（《自序》）作者的用心大概是：在儒佛都处于衰微的时候，使它们融合，产生出一点新机，以延续其生命。从这一点上说，作者的初衷实在难以实现的。

三

佛教源于印度，它在中国传播发展的历史，实质上是与中国本土文化不断融会的历史，即佛教中国化的历史。佛教在中国传播和发展的过程中，对中国的哲学、逻辑学、音韵学、语法学、诗歌、小说、音乐、绘画、雕塑、建筑、民俗等等方面产生了深刻的影响，佛教成了中国文化中固有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。在佛教中国化的过程中，不只是抄袭或简单地照搬印度佛教的理论，而是在此基础上有新的发展和新的贡献。

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发展，都和宗教有密切不可分割的关系。宗教具有它巨大的极为重要的社会动能，过去是这样，现在和将来也决不能忽视这种作用。从某种意义上讲，一切宗教其目的都是为了完善人自在的内在本质的规定性。人的内在本质是什么呢？历来的哲学家们争论不休。中国的儒学大师孟子认为，人人都具有先验的善端，人性是善的；而法家的集大成者韩非则认为，善则后天形成的，人的本性是恶的。这两种认识，不能说不具偏颇性。西方有的哲学家说：“人类的地位是在神与兽之间，时而近乎神，时而近乎兽”（普罗提诺）；有的说：“人，从本质上说，是一种可怕的野兽”（叔本华）；有的说：“人，就是大自然的终极目的。宇宙中的各个角落没有任何物能够像人这样容易地把自己组织起来”（爱默生）；有的说：“人是一种政治动物”（亚里斯多德），或“人是一种会制造工具”的动物”（富兰克林）；还有的说：人的本质，就其现实性说，“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”（马克思）等等。或许，哲学家们对

此问题还会争论一万年，因为从不同的角度去界说，就会有不同的结论。但是，不管怎么说，人之作为人的内在本质就是：理性、智慧、仁德、慈爱以及对理想的追求。先哲亚里斯多德说得好：“如果人没有美德，人就成了动物中最邪恶、最残暴、色欲与食欲也是最大的动物。”因此，任何社会、任何人都必须修身养性、治心，树立社会公德，发扬人的善性，提高人的道德素质，具有绝对重要的意义。特别是在人欲横流、不仁不义、不忠不孝、道德沦丧，社会公德、道德素养每况愈下的情况下，更应该如此。否则，社会将失去平衡与和谐，产生不安定的局面。为要治心，佛教具有它特殊的作用。

佛教的理论基础是“缘起性空”论，以有性众生为根本的研究对象，以此来揭开人生的秘密，使有情众生解脱人生的种种痛苦与烦恼。为此，佛教十分重视心、心所的研究，并且作出了详细的辨析，探索人的行善行恶的原因，提出对治而使人心净化的方法，从而除恶扬善，积善行德，使人的道德达到圆满的最高境界。佛教道德的总精神是：“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，自净其意，是诸佛教”。佛教把是否“利他”作为划分是善还是恶的标准，提倡“自利利他”。对自己对他人都有利者是善，对自己不利对他人有利者是大善；对自己对他人都不利者是恶，对自己有利对他人不利者是大恶，即损人利己者为大恶。因此，佛教提倡以慈悲为怀，不但要怜爱自己的亲人、同胞，还要爱一切人，甚至怜爱一切生命，提倡十善，反对十恶。十恶指杀生、偷盗、乱搞两性关系、说假话谎话、挑拨离间、骂人和恶语中伤别人、言语下流、贪心、发怒、偏邪与邪恶的观念；与此相反者为“十善”。此外佛教还把窃取他人之物、抵赖债务、吞没寄存的财物、欺罔共有财产、因便侵占、借势苟得、非法经营看作是恶的行为，等等。总之，佛教主张慈悲为怀、积善行德。所有这些在人欲横流、道德堕落、人性异化的社会环境中是非

常具有实际意义的。

第二，佛教是非常哲理化的宗教，其中具有无穷的智慧和科学的方法论。要对此问题作出深入的研究，务必写作专论。这里只举例说明：

一，佛教说，世间一切事物都是因缘和合而成的，没有独立自在的主体。这是先哲深邃的智慧，而且是科学的结论。它与现代哲学说的宇宙间的一切事物都是依一定地点、时间和条件为转移的这个论断是一致的。现代科学也证明，宇宙的一切事物都是由一定的要素构成的，依一定的条件而存在而发展。大至太阳系、银河系直至一切星系；小至分子、原子、基本粒子均是这样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事物构成的要素、结构发生了变化，事物的性质也就发生了变化。或生或灭亦是如此。任何事物的生灭不是无原而生，也不是无原而灭，总是处在因果相续、物质守恒之中的。佛教的缘起缘生的理论揭示了宇宙发展变化的真理。因此，要求我们看待事物不能绝对化和僵死化。

二，佛教还提倡中道、反对两边（两端）的方法论。佛教认为，偏于“有”或偏于“无”，偏于“假”或偏于“空”都是“边见”“邪见”。主张亦有亦无，非有非无；非空非假，亦空亦假；非一非一切，一即一切；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；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；“假”中包含着“中”和“空”，“空”中包含有“中”和“假”，“中”中包含有“假”和“空”。总之，“有”与“无”，“空”和“假”是互相融入而不相碍的。即佛教讲的中道是圆融中道。这 and 现代哲学讲的矛盾的对立统一，中介基本上是相一致的。事实上，如果只把矛盾看成对立的两极，否认它们的统一与同一，否认中介是错误的。我们可以从佛教中道论中吸取辩证思维的智慧，用以丰富科学的思维方法。

三，佛教哲学具有对认识主体和认识对象作细致分析的特点，我们亦可以从中吸取有益的智慧。如佛教把“心法”分析

为：眼识、耳识、鼻识、舌识、身识、意识、末那识、阿赖耶识等八种。把“心所法”分析为：遍行五、别境五、善十一、根本烦恼六、随烦恼二十、不定四，共五十一个，即五十一心所。再如：把“色”分析为显色四、形色二十、表色八，共32个。把“苦”分析为：生苦、老苦、病苦、死苦、怨憎会苦、爱别离苦、求不得苦、五盛阴苦等等。总之，佛教哲学擅长于分析。这与儒道两家哲学具有明显的不同。儒家的“仁”、道家的“道”，其含义很广，但是，是很模糊的庞统的。虽然佛教的分析哲学与儒道的模糊哲学各有其妙用，但佛教的对认识主体和认识对象能作细致分析的智慧，令人钦叹不已。模糊认识是人类认识的一种形式，不论是过去、现在还是未来都有不可取代的地位，但是，在细加分析的基础上，更加准确地把握事物的本质和规律，从而具有更可靠的实证性和可操作性，却是认识发展的规律。所以，我们亦可以现代的科学方法为指导，从佛教的分析方法中吸取新的智慧。

第三，中国化的佛教作为中华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，它在建设现代中华新文化的过程中应该有它的地位和作用。若要弘扬中华文化，不认真研究佛教或否定佛教，不吸取其中的智慧和有价值的东西，那应该说是一个错误。如要不研究佛教，就不能真正懂得汉代以后中华文化发展的规律，就不能真正懂得我国哲学发展的高峰、宋明理学的特点，就不能真正懂得我国的小说、诗歌、绘画的风采和神韵，就不能真正懂得我国的民俗和民众的社会心理的特色，等等。总之，认真研究佛教是弘扬中华文化所必需的，是建设现代新文化所必需的。为要做到这一点，必须进一步克服和肃清左的影响。

总之，佛教中包含着深邃的智慧和无穷的知识，必须认真分析研究佛教中包容的一切，吸取其中一切有教益的东西，为建设社会文明服务。智旭的《周易禅解》亦可作为借鉴。

自序

智旭

藕益子结冬于月台，禅诵①之余，手持《韦编》②而笺释之。或问曰：子所解者是“易”耶？余应之曰：然。复有视而问曰：子所解者非“易”耶？余亦应之曰：然。又有视而问曰：子所解者亦“易”亦非“易”耶？余亦应之曰：然。更有视而问曰：子所解者非“易”非非“易”耶？余亦应之曰：然。侍者闻而笑曰：若是乎堕在四句③中也。

余曰：汝不闻四句皆不可说，有因缘④，故四句皆可说乎？因缘者，四悉檀⑤也。人谓我“释子”也，而亦通儒，能解“易”，则生欢喜焉，故谓是“易”者，吾然之，世界悉檀也。或谓我“释子”也，奈何解“易”，以同俗儒？知所解之非“易”，则善心生焉，故谓非“易”者，吾然之，为人悉檀也。或谓儒、释殆无分也，若知“易”与“非易”必有差别，虽异而同；虽同而异，则笼统之病，不得作焉，故谓亦“易”、亦“非易”者，吾然之，对治悉檀也。或谓儒、释必有实法也，若知“非易”，则儒非定儒；知“非非易”，则释非定释。但有名字，而无实性，顿见不思議理焉。故谓“非易”、“非

“非易”者，吾然之，第一义悉檀也。

侍者曰：不然。若所解是“易”，则人将谓“易”可助出世法，成增益谤。若所解“非易”，则人将谓师自说禅，何尝知“易”？成减损谤。若所解亦“易”、亦“非易”，则人将谓儒原非禅，禅亦非儒，成相违谤。若所解“非易”、“非非易”，则人将谓儒不成儒，禅不成禅，成戏论谤。乌见其为四悉檀也？

余曰：是固然。汝独不闻人参善补人，而气喘者服之立毙乎？抑不闻大黄最损人，而中满者服之立瘥乎？春之生育万物也，物固有遇春而烂坏者；夏之长养庶品也，草亦有夏枯者；秋之肃杀也，而菊有黄花；冬之闭藏也，而松柏青青，梅英馥馥。如必择其有利无害者而后为之，天地恐亦不能无憾矣。且佛以慈眼视大千，知群机已熟，然后示生，犹有魔波旬扰乱之，九十五种嫉妒之，提婆达多思中害之⑥，岂惟尧、舜称犹病哉！吾所由解“易”者无他，以禅入儒，务诱儒以知禅耳。纵令不得四益而起四谤，如从地倒，还从地起，置毒乳中，转至醍醐⑦，厥毒仍在，偏行为外道师，萨遮为尼犍⑧主，意在斯也。

侍者再拜而谢曰：此非弟子所及也，请得笔而存之。

崇祯辛巳仲冬，智旭道人书于温陵之毫馀楼。

【注释】

①“禅”即“禅定”：意为“静虑”、“思维修”、“定”等。东汉时，安世高将印度的禅学传入中国，唐代，慧能（638—713）创立禅宗。禅宗又称佛心宗，是中国化的佛教派别，哲学

上属心学的范畴。提倡心性本净，佛性本有，见性成佛。主张即身成佛的“顿悟”、不读经、不礼佛、不立文字、教外别传等。其禅法以定慧为本。“定慧”即“无所住而生其心”，“无所住”指“定”，“生其心”指“慧”，禅宗的一切思想都是从这个定义中引申扩充而来的。禅宗所依据的经典先是《楞伽经》，后是《金刚经》，六祖慧能的《坛经》是其重要的代表性的经典。《周易禅解》即以禅宗的思想解《周易》。“禅诵”，指诵读禅宗的经典之类。

②“韦编”：指《周易》。司马迁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说：孔子晚而喜《易》，“读《易》韦编三绝”。韦，熟牛皮。上古时代用竹筒写书，用牛皮条编联起来。因有“读《易》韦编三绝”的说法，所以，以后就用“韦编”代表《周易》。

③“四句”：指佛教以“有”和“空”来分别诸法的四种说法，即：有而非空，是第一句“有”门；空而非有，是第二句“空”门；亦有亦空，是第三句“亦有亦空”门；非有非空，是第四句“非有非空”门。这里的“是易”、“非易”、“亦易亦非易”、“非易非非易”与佛教的四句分别没有多少区别，所以说，“堕在四句中”。这是佛教哲学特有的思维方法。

④“因缘”：是“因”和“缘”的合称。泛指一切事物生灭所依赖的原因和条件。“因”指起主要的直接作用的条件；“缘”指起辅助作用的条件。因缘在这里指依赖一定的条件，上述四句是可以这样说的。

⑤“四悉檀”：指佛说法不出这四悉檀。悉檀，成就的意思。谓用这四法来成就众生的佛道。1，“世界悉檀”：指佛首先顺着凡人之情用“人”、“我”等假名随顺众生所乐而说世界之法。2，为人悉檀：指佛说法鉴于众生的机缘，随众生机宜的大小、宿种的深浅，说以各人所应之法，使其发起正信，增长善根。3，对治悉檀：指有针对性的施以教化，贪欲多者教以慈心，愚痴